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X光、日本精神史、台灣：評鶴見俊輔《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1931-1945年》

X-ray,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Japan, and Taiwan: A Review of Shunsuke Tsurumi's Senjiki Nohon No Seishin Shi, 1931-1945

doi:10.6752/JCS.200803_(6).0012

文化研究, (6),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2008

作者/Author：陳培豐(Pei-Feng Chen)

頁數/Page：268-27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書評

《文化研究》第六期（2008年春季）：268-273

X光、日本精神史、台灣：評鶴見俊輔

《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1931-1945年》

X-ray,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Japan, and Taiwan:
A Review of Shunsuke Tsurumi's
Senjiki Nohon No Seishin Shi, 1931-1945

日文版：

鶴見俊輔。1982。《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1931-1945年》。東京：岩波書店。ISBN：978-4-00-001157-0，268頁。

中文版：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2007。《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台北：行人出版社。ISBN：978-986-83442-2-8，296頁。

陳培豐

Pei-Feng Chen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不論對於台灣讀者或日本讀者而言，這都不算是一本很新的著作。在日本，本書最早是在1982年（昭和57年）問世；在台灣，中譯本也早在1984年便曾由李永熾教授翻譯出版過。在並不積極翻譯日本學術書籍的台灣，一本著作能多次被翻譯出版，證明其存在價值與品質。本書在台灣有多受歡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日本，這可是一本發行半年內便七刷的暢銷書。從市場機制的觀點來說，一本好書是不受時代制約而能歷久彌新的。

《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1931-1945年》（下文以中譯本書名簡

稱《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的作者鶴見俊輔生於日本，十幾歲時便到美國，1942年從哈佛大學哲學系畢業。同年他也回到日本並於海軍服役。敗戰後的1946年5月，鶴見與都留重人、鶴見和子、丸山眞男等日本重量級的學者創立了《思想の科学》，這是一本到今天都還是受到高度評價的學術雜誌。之後，鶴見陸續任教於京都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並從事許多社會活動。對於台灣讀者可能必須一提的是，鶴見的外祖父是曾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全家與學術研究都有深厚的淵源，父親鶴見佑輔、姊姊鶴見和子都是赫赫有名的學者。當然，鶴見的知名度並不是靠著顯赫的家世而來，他原本便是戰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是以作者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講學時的上課講義編輯整理而成。本書共分成16章，鶴見所定義的戰爭時期是自1931年的滿州事件到194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這段時期。而在這段被公認為日本近代史上最黑暗悽慘、法西斯思想最猖狂的時代，日本在大正及昭和這兩位天皇的領導下，以「國體」之名，讓包括台灣、朝鮮這兩個殖民主地在內的整個日本帝國，都籠罩在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支配下；除了對外引發一些戰爭之外，在這段期間，日本國內也發生非常多的事件。鶴見就以日本國內外所發生的這些事件為論述題材，首先透過分析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背景和結構因素，接著討論在這些事件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政治家、作家、知識分子或人民，到底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去應對處理。沿著這兩條軸線，作者經過交織辯證後試圖告訴我們：近代日本人思想上的特質是什麼，而這些具有日本固有普遍性的特質又是從何而來。

鶴見認為，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一些指導者為這個新興的近代國家（日本）設計了一套相當巧妙的國家原理與結構，但隨著時代的演進，這些原來的設計者紛紛凋零之後，原本支撐著國家構造的內部力量便開始變形，終至變成凶猛的龐然大物暴走橫行在日本國內外。此際，新的國家掌舵者，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或平民皆無能力去制止這股強大力量，最後日本便開始走向扭曲之道路而迎向崩壞。

針對戰爭時期日本人如何試圖去修正、批判，甚至嘗試去抵抗國家主義，最後又如何受到壓迫繼而受挫或被收編，在精神思想上從原本自由、開放、普遍的態度而「轉向」保守、狹隘，終至成爲法西斯主義的「共犯」的過程，鶴見有相當精彩的論述（他本人便是日本近代史上思想「轉向」研究的鼻祖專家）。非但如此，針對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主義的修正爲何會不靈光，這些日本知識分子的掙扎、反省、抵抗又爲何會失敗，作者提出了他的解釋：因日本人強烈的鎖國性格，以及因此所形成在精神上的自我完結習性所致。鶴見覺得，由於島國位處於地理上邊陲的影響投射，自古以來日本人便一直猜測或擔心在自己居住以外的其他地方，可能或似乎存在著比自己更優秀強大的他者。這種具有深沈或不安特質的劣等感及鎖國特性，讓日本人所支持的國家很容易在某一些情況下，便突然搖身一變成爲具有攻擊性的猛獸。

再者，作者也強調日本人具有「曖昧」的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致使日本人不但不能確立普遍性的價值原理，更是縱容以「國體」爲名之國家主義壯大的助力。針對這種「曖昧」特質，鶴見原本寄予期待，盼望其能成爲當日本人在面對不同或對立文化時相互競合的一種手段。但是這個期待最終卻撲了個空。因爲這種具有內向、陰暗、消極的「曖昧」精神特質，基本上缺乏一種在困境中找出活路的生命力，以及自我反省的動力。爲此，鶴見給予「曖昧」的精神特質相當負面的評價，並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整體上來說，筆者認爲書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有關思想「轉向」的論述。思想「轉向」是一種針對人或人的精神、思想之研究，因此考察「轉向」其實便是分析「歷史」、「世界」與「個人」之間的繁雜關係。而相對於日本思想解析工作的繁雜與艱澀，作者的筆觸卻是相當輕盈、明晰，中譯本譯文也頗爲順暢。雖說如此，讀者在詳讀內容後恐怕會發覺縱使文字平易近人，但《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並不是一本那麼容易消化閱讀或理解的書。因爲在這本看起來不算很厚重的書籍中，光是出現的人物，包括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俄國人、台灣人等，至少就有260人。而且既然是有關思想精神或歷

史的書籍，這些人物往往夾雜著事件、思想主義而登場。透過分析這些事件的對應方式，作者才能以抽絲剝繭的方式來襯托出其思考或精神之所在與特質。因此，在閱讀本書時，讀者必須對日本近代史具備相當程度的知識背景，否則很難只憑文字敘述便能進入作者的論述脈絡。這對於對日本近代史或人物不是很熟悉的台灣讀者來說，顯然是閱讀上的負擔或考驗。

其實之所以會造成上述問題，其原因乃是在於本書的優點——輕盈、明晰、銳利、順暢、平易近人而不艱澀厚重。本書的書寫方式基本上省略了許多時代背景的說明。換言之，許多事件或問題是直接切入，以「未論先明」的前提去處理的。而這種書寫方式，就像是一本主題艱深精彩但卻欠缺序章的論文，很難讓讀者在基礎背景不明確的狀況下，去理解整體論述的原委，並進一步萃取出作者的真意（雖然書中第一章的部分具有序章的意味，但並沒有仔細地去鋪設這些基礎背景）。具體地說，除非對日本近代史有相當的涉獵，否則作為讀者，不管是日本人或台灣人，恐怕都很難知道：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政治家或指導者到底為這個近代國家設計了一套什麼樣的國家原理？這個國家原理或意識形態到底是在什麼狀況下去達成？具有什麼巧妙的原理結構？這與作者所提起的「曖昧」、「鎖國」、「轉向」之間又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它又如何導致日本由一個原本面臨滅亡危機的國家走向富強，繼而打敗許多強國？而在戰爭時期又是基於什麼結構性理由必須去壓制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活動？它又如何能在領有包括台灣在內的殖民地而變成帝國之後，修正其國家原理繼而引發戰爭，走向崩壞。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發行後不久的昭和57年（1982年）7月12日，《朝日新聞》曾經對本書作了介紹。在標題為「如同以X光透視內部」的書評中，評論者在肯定本書的內容後，寫出一段相當有趣的結論：

這本書可能因為原本是大學上課的講義，且對象又是外國人的關係，作者在試圖直接去碰觸「日本人的精神史」這個核心問題時，省略了一些細部性、枝節性、背景性的說明，換言之，就是將一些對於日本人而言可能已經習以為

常，和國家型態相關的說明或論述省略掉了。這個書寫策略讓讀者（日本人）在閱讀這本書時，有如在觀賞X光透視圖般，無法觀察到日本這個國家的全貌，而只看到消失在黑暗底片中而變成透明的輪廓。不過雖然如此，本書卻讓我們察覺到浮在暗黑背景中之人體內部深處的骨骼——讀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體會到的日本人的精神思想。這本書也就在如此異樣的感覺中，給予我們一種巧妙的感動。

作為一個台灣的讀者，筆者相當贊成26年前這篇書評的意見，也因此建議身為外國人的台灣讀者，如果也想「在異樣的感覺中萌生巧妙的感動」，可能必須要先下一些功夫，針對日本近代思想史，特別是國體論或天皇制國家原理等，事先作一點功課。

一些比較敏感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中雖然出現了許多事件和人物，但是在總計約260多個人物中，幾乎與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沒有什麼關連。探究戰前日本的精神史有許多取徑和方法，台灣當然不是唯一或必然的視角或取徑；然而讀者可能會好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精神和思想這些話語也陰魂不散似地跟隨著台灣——日本史上第一個，也是統治時期最長的殖民地。二戰結束，日本精神不但並沒有消失，甚至成為後殖民情境下台灣社會揮之不去的符咒。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每當談論到台、日歷史或相關政治議題時，日本精神幾乎是許多人士必然要碰觸或強調的焦點或指標，也因此描繪日本精神和台灣之間的關係的書籍，在台、日坊間到處可見。然而和對台灣與日本精神的歷史淵源、理解和熱衷相比，鶴見書中的台灣影像卻稀薄得可憐。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雖然曾經被詳細地介紹，卻只是用來作為解析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或思考的橋段而已。

有關這個現象，筆者認為，這是鶴見採取照X光的方式來透視日本人的內心深處之書寫策略所導致的結果。因為在這本書中，日本政治體制內的一些現象或事件，如果被當作常態背景來處理，便很容易在X光底片的暗處中消失不見。更進一步地說，日本的保守派或比較傾向法西斯的右翼人士的活動或精神，假如只被當成是襯托骨骼的X光底片時，台灣或與台灣相關的日本精神，同樣地將在X光底片的暗處中消失不見。因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國家主義的籠罩下，日治

時期在日本過著壓抑生活的所謂自由派文化人或信仰社會主義者，其和台灣之間的關連似乎比較薄弱。戰前與台灣發生密切關係者，不管是欺壓或統治台灣人的官僚，同情支援台灣人的政治家或對台灣存著高度興趣的文化人，比較起來所謂的右翼人士還是占了多數。

也因此從研究視角或取徑來看，鶴見書寫這本書的出發點或態度，基本上是立足在對於近代日本的批判、反省，而非肯定、讚美或辯護。而這相當符合戰後日本知識界或文化人的心之所向及歷史的軌跡，但卻同時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日間政治、社會、文化關係的窘境。近年來所謂「殖民地統治肯定論」的盛行，正是標榜台灣本土精神勢力與日本右翼間所萌生的同盟謀合關係，這些現象的出現和戰後「X光」的歷史觀有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存在。

戰後在日本，「台灣」好像只能在某些特定史觀中才具有能見度。日本知識界的現實似乎也在提醒我們：當我們在讚美《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是一本好書之際，不要忘記這本書本身其實也是「戰後」日本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寫照。